

随笔

# 陪梅花再坐一会儿

王祥夫 文/绘



华诚最近出版了一本随笔集，书名便是《陪花再坐一会儿》，这书名可真是好，竟让我想起日本川濑敏郎的《每日一花》，没事翻这本书，看看里边的各种花，感觉是一种休息。

华诚的陪花再坐一会儿，分明是已经坐了一会儿了，而舍不得那花，就索性再陪它坐一坐。这简直就是诗一样的好。这又让人想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那个名篇《花未眠》，文章写的真是静气，深夜里一花一一人相对，有无限的意思在里边，但要想把这意思说清楚好像还不太可能。华诚的这个再陪花坐一会儿我想应该也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，如果像数年前我们去武汉大学去看樱花，人像潮水一般流动来流动去便全没了一点点意思，感觉像是在集会，我个人不太喜欢集会，太热闹的事我也不会太喜欢，樱花开的时候，人自然会多，在树下铺开一块洁净的白土布，然后大家都静静坐在那里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，只看花，花是主人，人是客人，是人在陪花。就像我们民间的陪客，主客一时衣衫干净面目也端正佳好，即使是不说什么心里亦是满满的喜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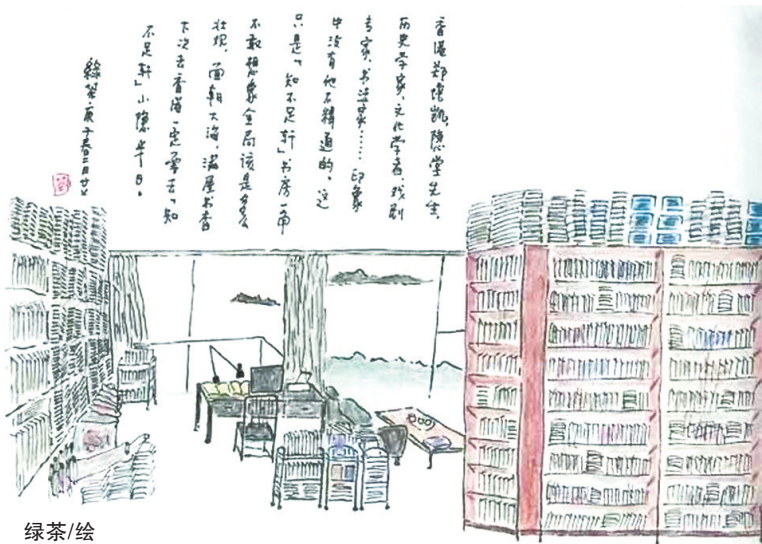
总记着那一年，随好朋友去了一个叫“红沙坝”的地方，那地方远远近近不见一个人影，青天白云真是阔远，往山坡上走，且有清风从上边拂然拂然地吹下来，一上山坡，那株开花的大树便赫然出现了，那么大的树，满树的繁花，百朵千朵俱静静地开着，我们一时都没了话，人世间的惊艳便是这样，只有无限的爱意，却找不出一句话来说。这样的大树繁花，原来竟可以是全不管世外的管弦与人间万丈的红尘，竟开得这样静好。多少年过去，我还常常想起这株开满繁花的大树，就像时时会想起昔日的情人一样。如果这株树还在，春天的时候真想再去陪它坐一坐。这种心思也真是好，只想一想也便好到十分。不知道华诚是陪什么花再坐了一会儿？

我呢，此刻想到的却是梅花，要陪梅花坐坐，也不要香雪海那么多的梅，也不要南京元墓那么老的梅——也着实太多，只希望有那么一株两株，静好地开着。梅开的时候天气还不会热，所以陪梅花去坐那么一坐还是要多穿一些衣服，如果恰好还刮风或者下着雪，最好还要戴一顶棉的风帽。现在看古人的画，常见有人戴着这风帽在那里行走。风帽一般都是棉的，没见过有单的风帽，而且要以布的为好，老和尚们现在还有的在戴。而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许多同学也都在戴，戴着这样的帽子在操场上跑来跑去，风帽原是极普通帽子，只不过帽子的后边一直披下来可以把后边的脖子全部遮严了，披下来的这部分若是再大一些还可以把肩膀也顺便遮盖住，这样可以不让风吹进去，风帽可以说是最普通实用的一种帽。戴着一顶这样的风帽，穿着厚墩墩的棉衣，与梅花一同坐在风雪里，之外不要任何别的东西，既不要茶也不要烟芋头。

有时候我想，什么时候有机会我就是要这么陪梅花好好坐一会儿的，只可惜今年是来不及了，南方的梅花大多都已经开谢，即使没开谢，今年也好像没这个心情。那么，就在书本里陪梅花先坐一坐吧。

绿茶兄是好书流通的推手，擅长速写，喜欢摹画读书人藏书的情况。我很喜欢他的速写，质朴有趣，淡雅之中表露了爱书的深情。他要画我的书房，正赶上疫情肆虐，没法前来香港，于是，我就对着平时工作的书桌照了张相，把左侧沿墙的一溜书架也照进去，颇有点坐拥书城的架势，寄给了他。他按照图片画了张“书房一瞥”，笔调清丽，用色淡雅，好像我读书写作的地方十分宽敞雅洁似的。其实，我目前读写的地方是我们家的客厅，是太太迫不得已让出来的空间。

十年前刚搬进新居，原本有间书房，有一米长半米宽的书桌，有可以高矮伸缩的弹簧靠背椅、两个高度一米八的梓木书架，临窗还有两米长的窗台，可以望到船湾水库，远眺是吐露港往塔门出海的波澜，十分赏心悦目。曾几何时，画册书刊蜂拥而至，书房早已成了书刊的堆栈，叠床架屋，从书架到书桌到座椅到地板上的每一个角落，堆满了书籍与文房用品，窗台上是一摞一摞的剪报与宣纸，哪里还有书房的雅趣？想进去找本书册，跨一步都困难，每走一步，都得披荆斩棘，把这批书搬到门外，那批书得叠累起来，像杂技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叠加七八张桌椅那样，尺寸不一的书刊成了道具，颤颤巍巍，随时都可能出现山体滑坡的惨剧。太太看我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，让出饭桌让我摆出文房四宝，可以练习书法，又把客厅隔开了一半，置放了两张书台，



绿茶/绘

算是我们两人的工作空间，实在说不上雅洁。倒是书台在客厅摆放的位置很好，正对着落地的长窗，抬头就看到一片水域，以及海湾对面的八仙岭与大帽山。山岚共海色相映，朝晖与晚霞作伴，平添了自然野趣的召唤，虽然不一定带来创作的灵感，总能在书桌前眺望良久，让遐思远扬。

朋友问我一共收藏了多少书，我估摸着算了一下，在香港大概有三五万册，堆得满坑满谷的，给我平添许多烦恼。除了客厅之外，两间客房都让给了书架，基本按照主题分类，有辞典书目类、戏剧戏曲类、明清历史类、书画陶瓷类、哲学思想类，以及中外诗歌、茶饮园林，虽然汗牛充栋，却与藏书家的收藏大不相同。我买书都是因为兴趣所在，买来看的，不是为了收藏，也就不大讲究版本，没有什么值钱的珍本书。以前在纽约书房里有一批英文书，是比较珍稀的，都是美国19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和旅游作品，基本上都是第一版，而且许多都是传统需要裁边的装订版式。这些书是我在波士顿、纽约，及新英格兰乡间逛旧书店搜罗的，一般都是从当地世家散出，不少连边页都没裁开，看来是世家用来装点门面的。二十多年收了七八十种，离开美国的时候，暂时贮藏在某处地下室，不知怎么就再也不见踪影，也不好去调查，从此断了我收藏珍稀书籍的念头。

还有一批是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买的复本，有洪业过世之后捐赠的藏书，有赖肖尔捐赠的《哈佛亚洲研究集刊》，从创刊号开始的二十多册。离开美国到香港教书的时候，走得匆忙，都一并交给舍弟清理，捐给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公立图书馆了。此外，我以前喜欢读推理小说，因此购买了所有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与乔治·西默农的探案小说，大概总有一百多种，也都随手散去了。

也有些书，因为研究所需，我一直随身携带，半个世纪下来，也就成了珍稀之物了。如阿瑟·韦利的《敦煌歌谣与故事》(George Allen & Unwin, 1960 第一版)，潘承弼、顾廷龙的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(上海开明书店, 1941 年版)，顾苓的《顾云美卜居集手迹》(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 1958 影印版)。这一类的书，手边实在不少，都是平常使用的，在藏书家的眼里，不过是砖石瓦砾，连古籍都算不上。倒是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有所不同，因为扉页有顾廷龙先生亲笔的题识。

绿茶画的当代书房，范围相当惊人，包罗了文人的二十二间、学人的二十七间、书人的二十四间、友人的三十二间、故人的十五间，总共画了一百二十幅，其数多于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，比陈老莲画的《水浒叶子》要多得多了，可谓壮举。许多人的书房都有别致的名号，如钟叔河的念楼、陈子善的梅川书舍、李辉的看

回味

郑培凯

## 书乡的笔墨记忆

云斋等等。他还请每位书房主人列举几本推荐或珍藏的图书，让人看得心痒难挠。虽然我的书房已成了堆栈，从来没能挂上书斋的匾额，我却曾经有过假想的斋名，还有名人为我题署。事缘二十年前，王己干(季迁)先生来香港看画，到访城大中国文化中心，我请他为中心大门题写楹联，用朱熹的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养转深沉”联语。他问我要不要再题写什么，我就随口说，帮我题个斋名吧。王先生很客气，问我书斋雅号是什么，其实我那时在香港还没有买房，没有自己的书斋，临时想到了《礼记·学记》的句子，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然后能自强也”，就说“知不足轩”很适合我。王先生回酒店休息，第二天请朋友送来了一尺半的大字条幅“知不足轩”，墨浓笔重，气韵生动。我请师傅装裱加框，足有二尺来宽，因为体积偏大，一直收着。有了书房之后，想挂出来，却找不到适合的空间，这么一拖，书房成了堆栈，书斋之梦不再，斋名题匾也就淹没在书灾之中了。

绿茶图绘了百多间现代读书人的书房，有极为珍贵的善本收藏室，有琳琅满目的高雅书房，也有我家这种书籍的堆栈，显示了当代藏书与堆书的真实情况，反映了21世纪中国读书人孜孜矻矻、念兹在兹的环境，在中国图书史上，为私人藏书与书房记下了珍贵的笔墨。

### 人物

原因各有不同，结果基本相同，年人均收入全都不足2000元。还有就是贫困程度有所不同，比如朱振忠因学、因病、因灾致贫较为突出。朱振忠去年因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。那时省里还没有出台健康扶贫“三保险、三救助”政策中的“136”政策。这项政策规定，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“三保险”报销，确保住院总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90%以上。其中，医保目录内费用，个人自付住院实行“136”控制机制，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个人年度负担总额不超过1000元，在市级医院不超过3000元，在省级医院不超过6000元。朱振忠没赶上这项好政策，

一场手术花光了他全家的积蓄不够，还欠下了一大笔债。他的孝顺女儿朱金花因此被迫失学，不得不在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和祖父，同时承担起养家的责任，拿起鞭杆去放羊，成为一个女羊倌儿。

杨河芬和朱胜康、南兴国、夏春涛商议了几次，决定向张西河乡党委和政府做一次详细的情况汇报。由杨河芬汇报，朱胜康补充，驻村扶贫工作队成员老张和小王参与。张西河乡党委杨书记听了汇报，半晌无语。杨书记说：“听了河芬书记的汇报，心里很不好受。相信同志们和我的感受一样。你们在扶贫一线工作，环境艰苦，任务重大，作为乡党委书记，我代表乡党委、政府向你们表示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64

蒋蒋  
京 昀  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感谢。许家窑村的情况，我有所了解，但了解得没有你们深，没有你们透。扶贫工作是当前从中央、到省、市、县都极为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作为乡，责无旁贷。对于你们的工作，以后我会特别关注，积极配合，必要时还会主动靠前。你们做出的规划，乡里研究后会全力支持。”

连载

■ 山西经济出版社

27

王宏伟  
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特别是她在台上本真地高歌：“啦啦啦，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……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……”尤其令人难忘，虽然歌声中还夹杂着上海方言，但却不胫而走，广为传扬，久唱不衰。后来在聂耳帮助下，“小毛头”告别报童人生，掀开演艺生涯序幕，并迅速成

为上海滩一名小童星。不久，导演费穆计划拍摄电影《人生》，一直找不到扮演童年阮玲玉的最佳人选，经聂耳推荐，“小毛头”前来试镜，竟被导演一眼相中。因为有了在《扬子江的暴风雨》中的出色表演，所以这次“触电”演电影，“小毛头”表演得很到位，演活了童年阮玲玉，受到观众称赞。

进入演艺圈后，“小毛头”身价倍增，可是她却大字不识一个，别说剧本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这时，有位自称姓张的影迷，找到她说非常喜欢她饰演的角色，并愿意资助她去学校读书，还为她取了个动听的名字——杨碧君。从此，“小毛头”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芳名。

就这样，杨碧君进入上海培华小学，毕业后又进入南洋中学，学业一直名列前茅。直到1982年，杨碧君才知道当年资助过自己的恩人真名叫张光锐，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。

中学毕业后，不满20岁的杨碧君成功主演了《青春》《暴雨梨花》《寒江落雁》《迷途羔羊》等十多部影片，成为红极一时的影坛明星。1944年，中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《100位男女明星特写》，杨碧君名列第41位，除了介绍她的演艺生涯外，还配发了一张楚楚动人的明星照，足见其当时事业如日中天。此时，杨碧君还找到了自己的爱情。她和丈夫严折西的缘分还要感谢聂耳。

文艺